“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景迈山古茶林的千年智慧传奇

当地时间9月17日15时33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举办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成为中国第57处世界遗产，这也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①傣族采茶姑娘。 苏 锟/摄

②手工制作茶叶。 谭 春/摄

③布朗族姑娘正在泡茶。 谭建国/摄

④布朗族祭“茶祖”。 自培平/摄

夏末秋初的一个夜晚，云南普洱景迈山中的一处民宿，服务员们“变身”一支多民族乐队，布朗族、傣族、拉祜族、汉族的年轻人，弹起吉他、敲起手鼓，用各族语言唱起了歌，其中竟还有拉祜语版的《加州旅馆》。山里人家被古茶林环绕，载歌载舞直到夜深，千百年一向如此。

当地时间9月17日15时33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举办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成为中国第57处世界遗产，这也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标准，反映了传统茶祖信仰基础之上，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古茶林保护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充分尊重了当地气候条件、地形特征和动植物种群，实现了对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中国的古茶林成为世界遗产，世界认识了景迈山。但对景迈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茶，是生活；茶园，是家园。

80岁的苏国文是云南省级非遗“普洱祭茶祖习俗”的传承人。每年4月，景迈山的布朗族会迎来最重要的节日——山康茶祖节。他们将一年中最好的春茶献给“茶祖”帕哎冷，祈求保佑茶林和村寨。

景迈山的布朗族先人帕哎冷留下遗训：“我要给你们留下牛马，怕遇到灾难死掉；要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也怕你们吃光用完；所以只给你们留下茶树，让子孙后代取用不尽，你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一代传给一代，绝不能让它遗失。”

“这个节庆起源于茶叶还未大规模商业化的时期，所以并非为了商业目的。过这个节日，就是纪念我们的祖先，牢记祖先留下的遗训。1000多年来，我们都是按照遗训来奋斗、来生存的。”苏国文说。

景迈山古茶林的智慧，绵延千年。

世界茶树的起源，千年前的“用地规划”至今科学

景迈山古茶林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涉及惠民镇的景迈、芒景两个村。遗产要素包括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3片分隔防护林，至今仍保持着蓬勃生命力。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世界上现代茶园种植技术普及前，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保存至今的实物例证和典型代表。中国西南地区的茶组植物，在第四纪冰期中存活下来，成为世界茶树的起源。10-14世纪，布朗族和傣族先民迁徙到景迈山时，发现野生茶树，于是在森林中建寨，在村寨周围人工栽培茶树，形成了智慧的“林下茶种植”技术。

何为“林下茶种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陈耀华解释，即在原始森林中间砍伐少量高大乔木，栽种茶树，形成“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立体结构，为茶树创造了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同时利用群落的生物多样性，防治病虫害并提供天然养分，从而可持续地生产出高质量的有机茶叶。

“这一种植传统通过延续至今的社会治理体系、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茶祖信仰’保持下来，传承千年且依旧充满活力，是森林农业开发和人类茶种植模式的典范，显示出了对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智慧。”陈耀华说。

在景迈山，我们可以看到先民在千年前做的“用地规划”至今仍十分科学：高高的山顶是世居民族的“神山”，也是各村寨的水源地，受到严格保护；古茶林和村落位于中部，整体上围绕“神山”，古茶林的外围又有分隔防护林，以防治冬季低温和病虫害传播；生产粮食和蔬菜的耕地则在海拔相对较低、水源充足的地区，避免开垦和种植过程对古茶林的干扰。

村寨围在茶林中，茶林隐在森林中。景迈山的村寨中，有这样的乡规民约：不能随意砍伐茶林中的高大树木，违反者需首先在寨心向茶祖请罪，然后负责修建一段村寨道路，完工后在路旁立牌写明自己所犯错误，警示后人。

多民族、多文化共存共荣

陈耀华介绍，景迈山茶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比如，芒景山茶魂台每组祭祀柱有5根，代表了布朗族、傣族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等景迈山的5个世居民族。因此，景迈山也是多民族、多文化共存共荣的典范。

位于景迈大寨的大平掌古茶林，因为地势平坦、形似人的手掌而得名。这是一片傣族村民种植和管护的茶林，以白象山为中心，面积310.98公顷，海拔1600米，是景迈山海拔最高的古茶林，在缥缈的云海之上。

景迈村村民、景迈人家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仙贡是一个80后傣族姑娘，2002年在重庆上完学回到家乡，与她的父辈一样，与茶为伴。她带着记者来到一棵带有“装饰”的茶树前，这就是这一片茶林的“茶神树”——傣族先民在每一片茶林中最早种下的茶树，保佑这一片茶树。

“我们对古茶树的采摘与利用也讲求适度与合理。目前主要在春、秋两季采摘茶叶，夏季不摘，保证茶树能够继续积累养分。采摘方式至今仍为人工采摘，采摘时都会注意留下新梢上的鱼叶（**茶树的第一片小叶子——记者注**）。”仙贡说。

茶树在精神上是景迈人的信仰，在物质上是重要的财产。“我们的茶林是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比如我要嫁到男方家，我的妈妈就会送我一片茶林当嫁妆，随我带到男方家，所以都会要爱护好它。”仙贡说。

芒景古茶林是布朗族来到景迈山以后最早栽培的一片古茶林，面积440公顷，也是整个景迈山面积最大的一片古茶林。芒景村村民南康的爷爷是景迈山布朗族的末代头人阿里亚，如今南康更愿意称自己为“景迈山讲故事的人”。

“布朗族认为茶是有魂的，而这个魂，是祖先的魂。所以每当新开发一片茶林，在这片土地上种的第一棵茶树，都要选择最好的日子。这棵树就成了这片茶林的‘茶魂树’。”

“景迈山古茶林中的昆虫非常多，有许多是对茶树有益的昆虫，像蜜蜂、蜘蛛这些，能吃掉很多害虫。而当古茶林受到虫害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不是用农药，而是万事万物的相生相克。所以，各家各户拿来稻谷、玉米等，撒在虫害严重的地方，既是一种祭祀传统，又可以吸引鸟类来吃米，同时消灭害虫。”

“景迈山的布朗族把茶当野菜，外出劳动时，带上米饭、辣椒和盐巴，采一些茶叶蘸着一起，就能当菜吃；我们还会用茶的嫩叶，蒸熟晾干后，放到竹筒中封好，埋到土里腌制成酸茶，吃的时候取出来，拌上辣椒等佐料。”

“牢记祖先‘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的古训。”讲完一个故事，南康总是重复这句话。他讲的这些故事，景迈山的每个人都知道，而将来，会有越来越多外面的人听到。

遗产地居民收入远超所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陈耀华说：“景迈、芒景两个村寨的劳动力，90%从事与茶产业相关的工作，茶叶收入占村民总收入的90%以上。遗产地居民收入远远超过所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这带动了遗产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促进了古茶林的保护。”

在仙贡从小到大的记忆中，当地茶区的生活一直比较平和，“吃的猪肉鸡肉可以自己养，茶树可以采茶卖钱”，所以村里年轻人出去打工的并不多。家家都有“分配到户”的古茶林，目前茶林带来的人均年收入约两万元。

10年前，仙贡牵头成立了茶叶合作社，如今已有200余户村民加入。合作社的建立，让景迈山的茶叶可以更集中、规范地销售，仙贡举了个很直接的例子——别人来买一斤茶，我们也能出具发票了。除了组织收购、对接市场，她还带着茶叶走到茶博会等平台，打响景迈山的名号，“申遗成功后，更多人知道了景迈山，我们也把茶叶品质做得更好，就能带来更多收入”。

芒景村村民、布朗族小伙岩砍出生于1994年。2013年，他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成了村上第一个去北京念大学的年轻人，“最久一次花了一星期坐客车才到北京”。学计算机专业的他，毕业后又回到了村里，还带回了新鲜的想法：茶叶做成面膜、精油，茶园外开民宿，给景迈山拍纪录片……

苏国文总结，景迈山自从申遗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路更宽、更结实、更安全，原来交通落后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二是电灯更亮了；三是解决了饮用水的问题；四是生态系统、古村落、民族文化等保护工作，得到了全面落实。

“我们不仅保护现有的古茶林和生态系统，还正在进行一项跨世纪的工程——生态茶园的改造，就是将原来的台地茶恢复成‘林下种植’的状态，就跟祖先种植的一样，就实现了祖先的遗训。”苏国文说。

后申遗时代，古茶林的“智慧”依然发挥着强大生命力

景迈山古茶林的申遗自2010年6月启动，经历了长达13年的历程；当年9月，普洱古茶园和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试点；同年11月，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后申遗时代，传承千年的景迈山古茶林的“智慧”依然发挥着强大的生命力。

云南省普洱市副市长胡剑荣说：“申遗之后，景迈山古树茶均价由2010年的500元/公斤，增长到现在的800-1200元/公斤。景迈乡村振兴示范园、景迈古树茶小镇等项目启动建设，知名文旅企业进驻，带动周边2600余名农民就业增收。”

胡剑荣介绍，以景迈山千年传承茶叶种植模式为启示，自2010年以来，带动全市136万余亩茶园完成生态化管理，其中，澜沧县完成37.9万亩；在景迈山下实施了普洱茶加工仓储物流园区、茶马古窖等一批生产加工项目；吸引了更多企业、游客来到景迈山，2022年澜沧旅游人数61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2.4亿元。

申遗成功，对景迈山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普洱市澜沧县委副书记、普洱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局长张丕生介绍，管理局下设遗产展示中心、遗产监测中心、遗产档案中心3个专业机构，面向大众展示茶树基本知识、景迈山古茶林遗产价值、民族文化等内容。

“未来将在惠民镇建设景迈山古茶林景区综合服务中心，计划配备停车位近1000个。那里距离景迈山古茶林遗产区13公里，游客达到以后将在那里停车，换乘遗产地提供的绿色环保通勤车进入景迈山，以更好地保护景迈山生态环境。”张丕生说。

于是之：演员是第二位的，人是第一位的

于是之去世十年后，《于是之全集》面世，解密演员的修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今年是于是之去世十周年，《于是之全集》近日出版。这是于是之存世文字的首度系统整理出版，由其夫人李曼宜在百岁高龄亲编。大量一手图文资料首次面世，字里行间揭开了一个演员的秘密：于是之何以成为于是之。

于是之曾有很多头衔：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但他最喜欢的是“演员”。

于是之在话剧舞台上和影视作品中塑造了很多光彩熠熠的人物形象：《龙须沟》中的程疯子、《骆驼祥子》中的老马、《茶馆》中的王利发……以及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以革命的名义》中的捷尔任斯基、《秋瑾》中的贵福……形成了独特的现实主义表演风格。而在去世十年之后，人们再次回忆起他，却又说“演员是第二位的，人是第一位的”。

学者、作家谢玺璋回忆自己当年在《北京晚报》做记者时，大家都叫于是之“老于”，不觉得是什么大演员或名角，“他没有那个架子”。给解玺璋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于是之的“正”：“一身正气，但又并不让你感到咄咄逼人。他很含蓄，对你特别热情。”

在解玺璋看来，与其说这是“演员的自我修养”，不如说是“人的自我修养”。“做人做好了，舞台上自然有光彩。不仅是舞台上有光彩，生活中与人交往也有光彩。”

解玺璋说，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走过来的这批人，有一种强烈的重视自我修养的意识。于是之与李曼宜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总会有很多浪漫的想法或举动，于是之就会在信里“批评”她，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些书信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能够看出那一代人是非常心甘情愿地在规范自己。通过书信和日记，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精神的成长。精神的成长比身体的成长要重要得多。”谢玺璋说。

很多观众仍清晰地记得1992年《茶馆》的告别演出。那时候因为阿尔茨海默病的侵扰，于是之已经出现忘词的情况。演出结束后，他给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非常抱歉。那天，很多人在剧场里流泪，送别“王掌柜”。

关于那天告别演出的场景，于是之专门写了篇文章《92.7.16》，“这个日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它告诫我从那以后再也不要演戏了。”“当听到一位观众在台下喊着我的名字说‘再见啦’时，我感动得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从来没想到观众对演员有这样的宽容。”这篇文章连同当年的手稿，此次一并收录进《于是之全集》。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曾跟随老师田本相，一起去过于是之家里。她回忆：“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天气已经有点凉了。我跟田本相老师到得比较早，我们在楼底下碰到了于是之先生和夫人曼宜老师，他们在楼底下等着大家。”

每有学者或老朋友来家里，于是之都坚持亲自去开门，走的时候再送到电梯口。“我跟他讲话，当时他已经有些语言障碍了，但是非常耐心地、非常用力地想要解释，他怎么扮演程疯子、王利发，老马……他很努力地跟我交流对话，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年轻的后生晚辈、是个小人物而轻视我。”宋宝珍说。

于是之的儿子于永，没有接续父亲的事业从事表演，而是走出了自己的路。谈及父母，他记得，那时候家里每年都要买一本台历，一天一页那种，“每周六回家，家里经常没有人。母亲在电台工作，经常周末要出去转播实况；父亲有时候在首都剧场演戏，有时候到别的剧场演戏。于是我们都在台历上写上‘今天我干什么’‘你回来上哪吃饭’……”李曼宜至今还保留了一本当年的台历。

《于是之全集》

在外面，大家都说于是之是名演员，可在家里，于永和家人从没觉得父亲是一个艺术家，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家人之间是平等的，有什么事就互相说自己的观点”。当被问到父亲在家中是不是一位“严父”？于永说：“父亲没有教育过我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来自父亲的“教育”，那就是对学习、读书的强调，“在父亲的观念里，读书、有文化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东西”。

一个艺术家在家里应该是什么样的，作为儿子的于永没有体会过，家人更多的是陪着他着急上火，“说实在的，我们更多的是体会他的痛苦”。于是之被任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一副院长主持工作后，评职称、分房子、出国名额等，都需要他管，回到家以后一句话都不愿意说。家里人只能是呵护。对于是之来说，管理岗位是一种责任心，义无反顾，不计得失。

《于是之全集》中还用宣纸复刻了两幅于是之的书法作品——《学无涯》《留得清白在人间》，随书附赠读者。这既是于是之对自己的要求，对读者来说也是一种美好的希冀。

书 评

在“流动中”重塑“坚固”

如果说现代世界是“流动的”水，那么这些价值就是河中的石头，虽然经过冲刷，会变色和磨损，但是终究是一种抵挡，也具备某种永恒的力量。

□ 张 丰

《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是由四篇谈话组成的小书，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自传。

鲍曼为中文读者熟知，是因为他那篇《现代性与大屠杀》。作为一个犹太人思想家，他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不是希特勒这样的坏人“一时起意”，而是因为“现代性”中本身就包含着造成大屠杀的因素：冷漠、科学计算、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如果丧失人文精神和反省能力，仅仅是追求“理性化”和“效率”，有可能将人类带向灾难。

他对现代性的理解，核心概念是“流动”。他有一本书就叫《流动的现代性》，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变动、难以把握。现在，人们开始普遍认识到“不确定性”的存在，而不是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乐观，或许正好印证我们已经更“现代”了。

鲍曼的这种认识，和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他是波兰犹太人，年轻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德国入侵后，他参军抵抗侵略，但是二战后他作为“犹太人”又受到怀疑，不得不像很多犹太人那样逃到以色列。他的父亲已经移民过去，但是鲍曼在以色列感到格格不入，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新成立的国家”，最终也不受欢迎，辗转到了英国。

即使是社会学家内部，他也不是“正统”。他影响力巨大，研究涉及多个话题，但是又很难简单归入“左”或者“右”的阵营。这两年引进中文版的《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就颇值得一读。这本书处理的是消费主义的时髦话题，但是和“后现代理论家”不同的是，鲍曼始终有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人文关怀。

作为一位受过迫害的犹太人，鲍曼经常感受到的却是“幸运”。这是和自己的妻子做了对比：鲍曼参军反对纳粹，只是后来因为犹太人身份受到排斥，而妻子则差点被送到集中营。在这本对谈中，鲍曼谈到了很多自己的家庭生活，也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发展脉络。

他是一个家庭主义者，一个喜欢在厨房做饭的暖男，和妻子一起生活好几十年。这非常有趣，一方面，根据“流动的现代性”理论，爱情、婚姻和家庭，在当下都会更多受到质疑。人们更在乎一时的感受，拥有“长久的感情”已经不是年轻人喜欢的价值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爱和表达都变得更轻易，“生活”却非常困难。

因此，尽管注意到现代社会的“液态”性质，并以分析和展示现代社会的“变化”而在全球享有盛名，鲍曼本人却是一个“顽固”的人，一个不怎么变化的人。他不喜欢那种为了观光和休闲的旅行，因为在这样的旅行中已经没有了“发现”的乐趣，“现代世界”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也渴望到处走走，因为80岁后，已经不带学生了，他需要和各地的人交流，接受年轻人的“发问”。

读这样的“对谈”，可以把鲍曼本人当成一个“案例”：在变动不居、多元化的时代，作为一个人，该坚守哪些东西？如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个人又该如何度过一生呢？换句话说，我们的精神依托到底是什么？

鲍曼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信仰”。他本人并不是严格的教徒，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他又认为人没有“信仰”是很难接受的。他提出的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信仰”，人要相信有比人类更高的东西。他把这种看法，转化为一个略显奇怪的句子：为什么相信一个并不存在的神是重要的？

他也依然相信道德的力量。不过，他理解的道德概念，不是普通人认为的“做大多数都赞成的、符合主流观念的事”，在他看来，真正的“道德行为”，可能恰恰相反：在没有人监管甚至没有人评判的时候，一个人该如何行事？“最道德的事”，是在纳粹时期冒险拯救犹太人的德国人，但是按照当时的看法，这样做不仅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

这就是齐格蒙特·鲍曼相信的东西，是“顽固的”“坚硬的”。如果说现代世界是“流动的”水，那么这些价值就是河中的石头，虽然经过冲刷，会变色和磨损，但是终究是一种抵挡，也具备某种永恒的力量。

《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